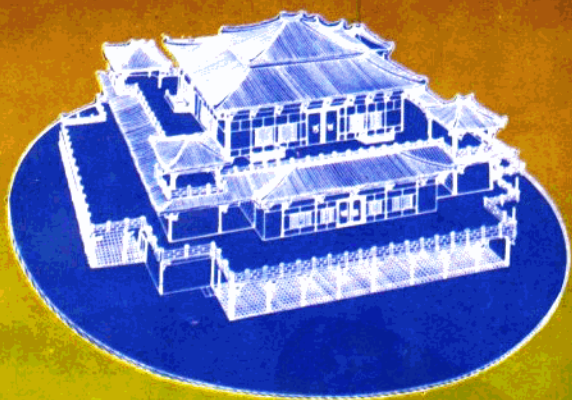


王莽新传

葛承雍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王莽从孤贫的儒生意想不到地当上了风云一时的皇帝，而作为“新”朝皇帝，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自主持改革的人物。但他要实现儒家治国理想的宏图，却走得太快太远，反遭遇艰难，终于在命运的狂风恶浪中惨败而死，不仅没有推出一个新时代，而且成为千夫所指的闹剧角色。

本书将完整地呈现王莽从正剧走向喜剧、悲剧的历程，察知他为后人留下的启示。

目 录

画外音.....	(1)
1. 五侯家族	(4)
2. 被服儒生	(10)
3. 崭露头角	(18)
4. 初次受挫	(24)
5. 戊午政变	(33)
6. 重返政坛	(40)
7. 外献祥瑞	(49)
8. 血门事件	(57)
9. 嫁女之悲	(63)
10. 加称宰衡	(68)
11. 策命九锡	(77)
12. 平帝之死	(85)
13. 居摄皇帝	(89)
14. 翟义起兵	(96)
15. 丧母夺情	(101)
16. 信奉符命	(106)
17. 禅让皇位	(111)
18. 改置官爵	(115)
19. 改币风波	(120)

20. 推行王田	(126)
21. 驰传天命	(132)
22. 五均六管	(137)
23. 内耗初起	(144)
24. 封授茅土	(150)
25. 威慑匈奴	(156)
26. 惩治贪贿	(165)
27. 沉溺谶纬	(169)
28. 家破人危	(176)
29. 危机四起	(183)
30. 流民发难	(189)
31. 豪族反叛	(197)
32. 政变流产	(203)
33. 长安动乱	(208)
34. 身后评论	(212)
尾声	(218)

附：王莽生平大事年表	(220)
------------------	-------

画外音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是一个跨越纪元前后的风云人物。作为汉代儒生群体的代表,他登上了封建社会入仕从官“成功”的峰巅;作为西汉后期外戚集团的成员,他步入了辅政职位的殿堂;作为一个王朝末世受“禅让”的皇帝,他把先秦以来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付诸实施;作为第一个在王朝末世搞“变法”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也颇受世人瞩目。也许正是由于他这种集儒生、外戚、皇帝和改革家于一身的特殊经历,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兴趣和大相径庭的褒贬,形成一种经久不衰的研究热。

二千年来的纵横流荡、沧桑巨变,并没有改变人们对王莽“篡权”、“野心”、“伪君子”的丑恶印象,这原因也许是我们民族某种久已成习的心理定势:看重的是传统道德,轻视的却是科学分析;敬重的是官位始终的将相,鄙视的却是失败的改革者;热心的是腐朽不堪的大一统王朝,冷落的却是变革制度的暂短新朝。从王莽的形象和变法改制评价中,似可觅得一些线索来。直至今天,王莽的评价仍然争长论短、莫衷一是,看来还得僵持下去,以便保持这个使历史万古常新的研究题目。或许这比随意“盖棺定案”要更有价值,何况王莽连埋骨的土丘也没有,更不会有苍松翠柏的棺木让人去盖。

在中国历史上,喜欢谈论王莽的人是何其之多,但真正理解

他的人又是如此之少。人们对他始终缺乏一种超越个人情感的公正认识，而陷入简单的“奸佞”或“否定”的迷津。为数众多的人按照传统伦理标准处理，红脸的神化，白脸的鬼化，似乎习惯于从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寻找出一个“乱臣贼子”，然后将一切责任都归之于他，这样，社会腐败就能得到解释，问题也仿佛找到症结，人们对此的追寻和探索也大体上停止了。

塑造一个面目可憎、十恶不赦的“奸佞”，不仅使权力无限的皇帝不负任何错误的责任，而且有利于保护封建政治体制和传统的伦理道理。似乎大逆不道者的乱世降临，只是因为千古罪人的出现，不是封建社会内部本身造成的。因此，封建统治者在谕旨中对“大奸大诈”的揭露与指责越厉害，文人墨客对那些殉葬者的批判也越激烈。结果是，在维护至善至美、不会腐烂的封建政治体制下，找一个伦理道德败坏的“靶子”受谴责，以此来解释他们不愿透露或不能追究的历史现象。这也是王莽被推向道德法庭审判而离真实面貌愈来愈远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王莽死后“乱臣贼子”罪名的成立，是出于封建政治的需要，那么对后人来说，除了史料经过曲笔篡改难以推翻先前定讞外，更多的是封建正统的幽灵纠缠着人们头脑，这是至今一些史家无法从传统文化“奸党佞臣”套路中走出来的一个障碍。在评论王莽时，鬼化和神化（如对刘秀）同时并行，从不牵扯到对社会机制的扬弃，对历史探索只停留在追查王莽的责任上，而不注意到他背后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仿佛历史只会重复循环而不会长驱直入，还给今天人们造成一种错误幻觉：我们民族久经忧患只是历史上个别人物造成的灾难，而不是民族肤体上本身存在着不可忽视而又不能容忍的巨大缺陷。

实践启迪我们，历史人物是某种社会力量的代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纵令是传统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也往往具有多重性、多向性和多面性，尽管历史人物研究可以屈从政治压力和形势宣

传而出现暂时性的扭曲，但经不起时间检验的评价标准不会永远凝固。评价历史人物不只是为他们个人树碑立传排座次，而是寻觅解开社会矛盾运动规律之谜的钥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不是帝王宫殿的麒麟阁，也不是文武将相的表功厅。

从历史留下的文字记载看，要彻底明瞭王莽这个在西汉儒生群体形成以来脱颖而出的风云人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政治的扑朔迷离常常令人咋舌，特别是史料不足与描述丑化的条件下，王莽已是一个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完全看透的历史人物。与其在褒贬好恶相持下徘徊不前，毋宁先做一些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尝试，在更多了解他、理解他的基础上去争辩和反思，这样也许会使历史迷雾淡化一些，会使人们以理智、冷静眼光去看这位二千年前由正剧走向悲剧的人物。

历史作为时过境迁的事实，应当是非常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又是相当主观的活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史学家对史料的一种主观解读，社会经历与感情不同的人，眼中的历史面目也会有不同的差别，甚至会有历史隔膜的误读。因此，请读者不妨按照自己的眼光，敞开看看此书。

1. 五侯家族

黄色丰厚的土地，凝聚出被尊为中华民族祖宗的化身——黄帝。相传黄帝下传八世之后生虞舜。因为舜起于妫汭河水，就以“妫”为姓。周武王时封舜的后裔妫满于陈地，是为胡公，到十三世时生“完”。完，字敬仲，迁移至齐国。齐桓公以他为卿，改姓田氏。经过十一世后，田和夺取了齐国君权，三代称王。田建时被秦国所灭。项羽起兵时，封田建孙子田安为济北王。汉朝建立后，田安虽失去封国，但齐人仍谓之“王家”，因而以“王”为姓氏。

这是王莽叙述其家族本系《自本》中说的，因此，王莽自称是黄帝嫡系后代。对这样家族起源已经湮没在一片混沌之中的黄帝子孙想象、比附，当然不必要去作繁琐的考证。但是很明显，“帝”与“地”相同，黄帝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按阴阳五行学说，水、火、木、金、土，正好是王氏祖先的“黄土”代替“刘”汉王朝的“火材”。“火生土”的“五德终始”历史循环论，正是西汉阴阳五行说与官方神秘主义结合成谶纬学说的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用来附会到王朝兴替和社会历史变动上的政治理论。遵循这条线索，便可清楚地看到王莽自述为黄帝后代所隐藏的心理印记。

其实，哪一个中国人不是黄帝的子孙呢？王氏一家一姓的世系传说，大抵是以超越家族系统的全民族神话英雄作为其核心人物，以此激发当时人们广泛的热情和崇拜，赢得更广泛的群众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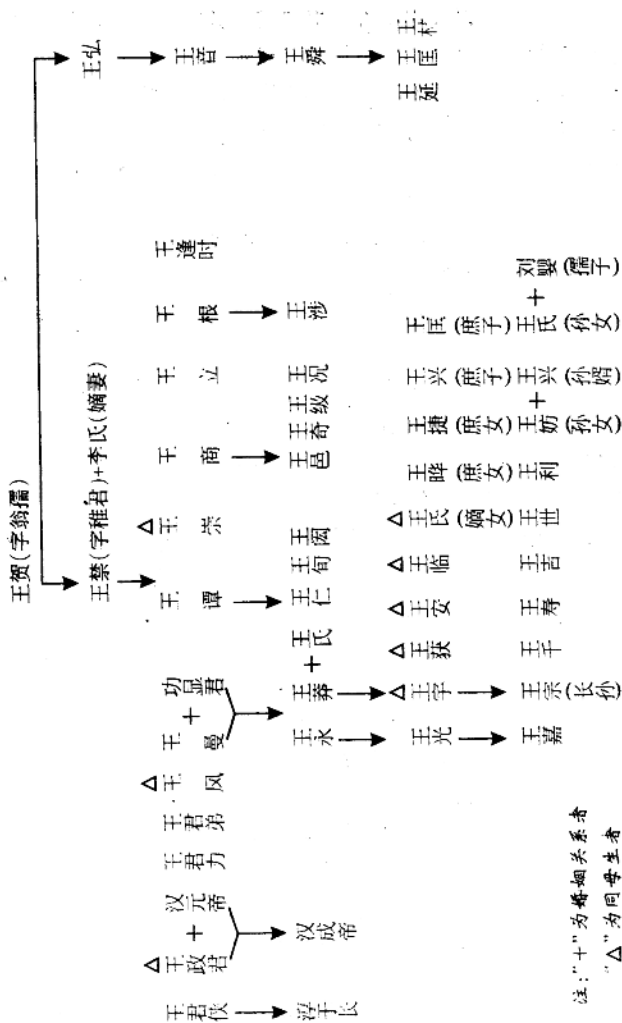
仰的基础。所以，用不着追根诘问王莽的祖先，作为一个托名黄帝后裔的新兴家族，较确切的记载是西汉文、景期间，王安（田安）孙子王遂（字伯纪），居住于济南东平陵，生子王贺（字翁孺），后为汉武帝朝的绣衣御史。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燕赵地区魏郡（河北邺县）有坚卢、范主等人纷起暴动，奔赴各地的御史皆奏杀二千石或不经奏报而杀千石以下者，株连者六郡至万余人，唯独王贺不杀人，地方官吏畏懦应当连坐者，均被纵放死里逃生。因此王贺以奉使不称职被免官，这位来自儒学发祥地的山东籍官员，自叹说：“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王贺被免官后，因与东平陵终氏有怨隙，于是迁移到魏郡元城委粟里，受到当地人的欢迎，被尊为“三老”。据说元城有年老善相面者，曾说过：“春秋时，沙麓崩，晋史卜之，认为：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这就是齐田的后代。今王贺迁移到的地方，正是当年沙麓崩坍之地，后八十年内，肯定有贵女兴天下。”这无疑又是谶纬预言的把戏，以“阴”附会元后，以“阳”比喻刘汉，王氏黄帝之后为“土”，刘汉是“火”，故土火相乘，阴盛而沙麓崩。而且从春秋僖十四年至元寿二年哀帝死，元后开始摄政，恰好是六百四十五岁。

不论载入正史的这段看相故事是否无稽之谈，反正王贺的孙女王政君不仅嫁给了汉元帝刘奭（shì），而且成为一个“垂帘听政”式的无冕女皇，则是真的。

王贺的儿子王禁，字雅君，少年即在长安学习法律，后为廷尉史。他胸有大志，不修廉隅，喜好酒色，行迹放浪，如同当时社会风行男子多妻妾一样，他也多娶小妾，生有四女八男：长女王君侠，次女王政君，三女王君力，四女王君弟；长子王凤，次子王曼，三子王谭，四子王崇，五子王商，六子王立，七子王根，八子王逢时。其中王凤、王崇与元后王政君是同母所生，他们的

王 氏 家 族 表



母亲是魏郡李氏之女，王禁的嫡妻，名叫李亲，后因妻妾之间嫉妒矛盾与王禁离婚，改嫁河内（河南武陟）人苟宾为妻。家庭关系的破裂和小妾庶子地位在宗法社会习俗中的低下，使得王莽的父亲王曼从小身份就不可能高贵，无法跻身于华族甲门之列，这样的家庭出身对王莽后来跃登政治舞台和一生的政治性格有着深刻的影响。

王氏家族的显贵，要从王莽的姑母王政君说起。传说李亲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生王政君时“梦月入其怀”，长大后“婉顺得妇人道”。曾许嫁未行，所许男家就死了。后又被东平王聘娶为姬，未纳娶男方又死。王禁很奇怪，就请“卜数者”来给王政君相面看禄命，“卜数者”看后连声道：“当大贵，不可言”。于是王禁才让其女儿习读经书，学练鼓琴乐舞。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18岁的王政君被选入掖庭为“家人子”，这在汉代女子十四五岁普遍初婚的年龄中，已不小了。入宫当年，就被汉宣帝选送给24岁的太子刘奭，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成帝刘骘于甲馆画堂，以世嫡皇孙的母亲身份有了立足之地。

不到三年，元帝登基，王政君也由婕妤立为皇后，其父王禁被封为阳平侯，叔叔王弘也被提为长乐卫尉。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王禁死后，长子王凤继嗣侯爵，为卫尉侍中。但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汉元帝很快就抛弃了王皇后，加之太子喜酒好宴，愈发使王皇后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而元帝宠爱的傅昭仪所生定陶共王刘康又多才多艺，故常有意欲废太子而立共王。王皇后、太子和王凤都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而内心忧惧，因而王皇后不敢争宠吃醋、后妃撕打，只有卑辞屈体、出口谨慎，作为保身避祸的武器，对傅昭仪的仇恨也由此埋下伏线，只不过是长于心计的王政君在这场角逐中不露声色罢了。

或许是王政君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谦恭姿态，或许是右将军王商和侍中史丹舍命保护太子刘骘，共王刘康没有被扶上继承

人宝座。竟宁元年五月，四十三岁的元帝一命呜呼了，喜好酒色的太子被拥上皇位，即汉成帝，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王凤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崇被封为安成侯，其他庶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皆赐爵关内侯，王氏家族从此开始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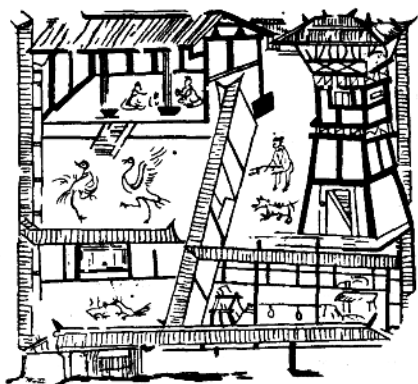
这年，王政君才三十八岁，但二十年的宫闱生活，已使她有足够的时间学会政治斗争，特别是权力之争的人事安排，对她来说逐渐熟悉。而十九岁的成帝这时正处于性冲动的青春期的，寻花问柳，沉缅酒色，根本无心于国政。虽有一些文吏、儒生给他提过很好的建议，但成帝不会也不愿处理当时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一切朝政委任其舅父王凤办理。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王政君的同母小弟王崇病死，其没有出生的遗腹子王奉世嗣侯，这对王政君又是一个打击，也促使了她下决心把自己的兄弟们全部提拔到贵族勋爵上来。第二年她就以成帝的名义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故世称“五侯”。王政君还曾让父亲王禁召还自己母亲李氏返回王家，并想让其母改嫁荀氏后生的荀参也封为侯，遭到成帝的反对，但毕竟还是给荀参安排了个侍中水衡都尉空缺，以表示对其母亲的孝心。正是在王政君的苦心安排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①。

然而，物换星移几度秋，王家兄弟子侄们跻身上流社会的强烈愿望竟是过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多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道。”老百姓歌谣道：“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据颜师古考释，这首歌谣内容编造的不是事实，曲

^① 《汉书·元后传》。

阳侯王根既没有引水作殿，第宅也不可能从长安到杜陵，但它至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上层贵族强烈怨恨的社会心理。尤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如王章等直言之士，对王氏家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刘向甚至公然上书成帝说：“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王太后当然也知道儒生们的指责，曾几次在自己的儿子成帝面前痛哭流涕，不食饭菜，以保全王家的支柱和兴旺。

王莽的血统里当然流溢着王氏家族的血液，但外戚的大门并不是对所有成员都畅通无阻，伯叔兄弟们的荣华富贵和下层民间的吃糠咽菜，不会不给他的童年留下深刻的印象，儒生们的猛烈抨击，也不会不刺激着他以后力图改变这种不良的形象。



汉代住宅画像传

2. 被服儒生

自称是黄帝、虞舜嫡系子孙的王莽，出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后来据他自己说，这年他家祖籍山东济南东平陵坟头上枯木生枝，无疑是星移斗转、重见天日的好兆头。因此，他每每自诩“皇始祖考虞舜”。

这类胡诌现在当然无人相信。实际上，王莽出生后，虽然姑母王政君早在他出生前三年已被立为皇后，但在这种妻妾众多、子孙满堂的家庭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何况王曼与王政君又不是同母所生，因而在礼法上嫡庶地位相差悬殊。雪上加霜的是，王曼年轻时就病死了，从汉成帝建始元年王家兄弟赐爵关内侯中没有王曼来看，王莽起码在十三岁以前就没有了父亲，失去了人生第一个保护者。大概在他十八九岁时，他哥哥——任职诸曹的王永又病死了，使他又失去了一颗心灵的避风港。问题的严重性是，汉代社会盛行兄弟间分财异居的“生分”行为，像王莽母亲丧偶又丧子的残破型家庭，首先面临的就物质生活的匮乏，只有依靠嫡庶兄妹们的救济。王莽的堂兄弟都是将军列侯的儿子，仗着有钱有势以奢侈浪费，车马众多，姬妾漂亮，玩乐新奇，互相媲美。而王莽却一个人孤独贫寒，因而屈己下人，恭敬俭朴。可以说，愁苦、哀怨、伤感几乎成了王莽青少年时期的伴侣。这对他以后要“救世赈民”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

大约在王莽十八岁时，他与昭帝末年丞相王祈的重孙女王氏

结婚，虽然王莽岳父王咸承袭祖父封爵为宜春侯，但也不过是个挂空名的败落家族，并没有给王莽悲忧的家庭带来崭新的天地。这次联姻，或许是由王氏家长和王莽母亲的操纵，是因为女方祖籍也是山东济南同乡，还是因为女方家里封侯汝南还有点财产？那就知道了。反正从“同姓不婚”来看，或从王莽“身高七尺五寸”^①、生相口大、下巴短来看，双方的择偶标准都不是太讲究的。不过，王莽和他的“糟糠之妻”感情还是不错的，直到他称帝后，都没有再纳妃娶妾。这当然与西汉后期儒生们反对贵族们多妻蓄妾的社会思潮也有关系，王莽为了保持自己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是比较注意这些事情的。

从现有史料看，汉代人求学年龄多在十三岁以上，与相传的殷周时期公卿大夫之子入学年龄相仿，学业一般是三至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汉武帝以后，精通儒学经典成为仕宦的重要途径，当时人发出“经术苟明，其取青紫（高官）如俯拾地芥耳”的感叹。只要家境稍好一点，许多青少年便寻师学经，费时数年，有着强烈的求学作官欲望。王莽既不能指望依靠父荫嗣侯作官，只能走上苦读经书以图仕宦的道路。王莽是否上过太学，今已不可考证，但当时私人教授颇为发达，我们且列举几条史实于下：

一、吴章“治尚书经为博士……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汉书·云敞传》）。

二、疏广“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汉书·疏广传》）。

三、轅道“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汉书·朱博传》）。

四、翟宣“宣教授，诸生满堂”（《汉书·翟方进传》）。

五、珪孟“严彭祖与颜安乐俱事珪孟。孟弟子百余人。……

^① 汉人择偶身材标准男子为八尺（合今1.84米），女子身高七尺（合今1.61米）。汉制一尺，约合今0.231米，王莽身長七尺五寸合今1.73米，依当时人看还不够标准。

孟死，彭祖、安乐各颺门教授”（《汉书·儒林列传》）。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私人教授的风气非常普遍，这种“私立大学”可能比“国立大学”更能培养一些人才，于是，王莽也以沛郡人陈参为老师，学习《仪礼》和《周礼》。这两部儒家的重要经典，汇编了春秋战国的礼制和周代到战国的官制，对王莽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主攻《周礼》的同时，王莽还勤劳身心，广泛学习了其他儒家学说。当时邹鲁一带流传的谚语说：“遗留给子孙黄金满筐，不如精通一门经术。”也许是对炎凉世途的体认，也许是对儒家理想境界的向往，王莽的学习日益转变成为实现自我价值以博得社会承认这一更为实际的目的。

王莽的老师陈参，其父陈咸在成哀时期以精通律令做过尚书，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还被王莽置为讲《礼》祭酒。与陈咸、陈参相好的翟方进、萧育（萧望之儿子）等，都是当时的儒学大师。王莽以后又跟名家陈钦学习《左传》，由师今学转而师古学，兼纳经今古文两派学说，耳濡目染，所受儒家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王氏家族本身来说，虽然奢侈挥霍，姬妾成群，但是“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这种先秦以来“私门养士”的门风，对王莽也不会没有影响。王莽上台执政后，让自己的老师陈参、陈钦等在朝廷做官，与其说是一种“知恩”的报答，毋宁说也是一种“好士养贤”的制度。

不独如此，西汉后期的政局，儒生、文吏、外戚、宦官、佞幸等多种力量冲突纠结，异常复杂。从形式上看，自霍光专权以后外戚就成了最有权势的集团，然而真正决定政治动向的，仍然是儒生（知识分子）与文吏（行政官吏）。《汉书·何武传》记何武为大司空“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正反映了当时“朋党”双方的大致分野。尽管时有例外，但宦官、佞幸、外戚由于屡遭儒生攻排，其立场多与文吏相近。如果说昭帝时盐铁会议上的激烈论战，是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知识

分子与文吏矛盾长期积蓄的剧烈冲突；那么宣帝时丞相韦贤、魏相、丙吉，御史大夫萧望之，皆一时名儒。麒麟阁十一功臣，除权臣霍光、武将赵充国、韩增以及出使有功的苏武外，文官中有魏相、丙吉、刘德、梁丘贺、萧望之五人为儒者，余仅杜延年、张安世二人。众多儒生已被视为刘汉王朝的赫赫功臣了。元帝好儒，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王嘉、马宫当一大批儒者便占据了要津。儒生由在野而入朝任文化官职，又进而担当起公卿守相之职。他们仍然发挥着知识分子角色的作用，如读经著文、招徒教授或廷折面诤。名儒盖宽饶攻击宣帝不行儒术是“以刑条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甚至引《韩氏易传》要宣帝下台，结果被文吏强加罪名而被迫自杀。萧望之、周堪、张猛、京房等人坚持儒术，亦与“久典机枢、明习文法”的宦官弘恭、石显以及一批“能吏”展开长期的生死斗争。成帝为太子时，曾随从儒家大师张禹学《论语》，对儒生们的复古改制之议略有兴趣，但马上受到文吏、外戚们据“汉家故事”的阻撓，建始二年，儒生师丹、翟方进等50人据《礼记》主徙，而外戚许嘉等8人坚持照旧不动。哀帝时，何武奏定改三公州牧，朱博、王业等遂以“故事”为称“专抑儒吏”，排挤儒生师丹、孔光，并依附于外戚傅党，但终究被儒生们攻倒。所以，西汉后期的儒生群体势力日盛，显示了旺盛不竭的生命力。在这种潮流下，不仅文吏群体成员或他们的子孙向儒生群体流动转入，而且连外戚也不得不向儒生靠近，《汉书·谷永传》记载王莽的叔父们“皆修经书，任政事”，说明没有儒学功底就无法出入官场，处理政事。同书《李寻传》也记载李寻曾向王根建议：“夫士者，国家之大宝，功名之本也。将军一门九侯，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曾如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因此王根“厚待”儒士。尽管王氏家族因奢侈擅权仍然受到儒生们的攻击，但外戚已向儒生群体靠拢甚至笼络他们，像当时名儒杜钦、杜邺、